

与盖世太保 周旋的人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与盖世太保周旋的人

德·梅德韦杰夫 著

磊 夫 陶七一 译
刘述运 唐仁模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八月

DQ51/10

与盖世太保周旋的人

德·梅德韦杰夫著

磊 夫 陶七一 译
刘述运 唐仁模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巨山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8¹/₂； 字数187.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9·21 定价：2.10

出版说明

《与盖世太保周旋的人》是一部纪实性小说。书中详尽地描述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敌后侦察员的伟大功勋。苏联统率部为及时获取德国占领军的情报，直接派遣侦察分队空降敌后。侦察员库兹涅佐夫乔装德军中尉携其情侣女游击队员瓦莉娅打入敌军内部，经常出入德军各种机关与盖世太保进行周旋，并在其他战友密切配合下获取了敌军大量情报，数次暗杀德军高级官员。情节曲折动人，引人入胜。

目 录

第一部 潜入罗夫诺林区

第二部 真假主人

第三部 向西挺进

第一部 潜入罗夫诺林区

(一)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一些令人意气风发、难以忘怀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在我的一生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的一生中，这种时刻则总是与受领党的任务紧密相联的。每当我接受任务时——我们这一代人的个人历史正是由一次又一次地完成这些任务来组成的，——我总会感觉到内心处于一种难于言表的“总动员”状态。那时全部的意念往往只凝聚在如何完成任务这一点上。而且渐渐地，执行任务的思考会发展、升华成一种梦幻似的东西，而后这梦幻又会变成清晰可见的实施方案。于是你可以奇异地看到等待你的明天，既充满艰难困苦又令人欢欣鼓舞的明天，你就会迫不及待地想开始行动，那怕拖延一分钟似乎也是不可忍受的。

四二年四月的一个傍晚，当我走在莫斯科那沉寂的、早早就断了人迹、暮色渐浓的街道上时，感受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心情。

我是不久前从勃良斯克森林返回莫斯科的。在勃良斯克森林里我曾指挥过半年的游击队。现在，上级指派我组建一支新队伍——一支由数人组成的队伍，将空降到敌人深远后方的乌克兰西部森林，在那里隐蔽下来，把当地居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积极展开对德国占领者的斗争。

……渐渐堕入暮色中的莫斯科的傍晚是寒冷的，也格外

静寂。即便如此，莫斯科也还是可爱的。在中央电报局附近的高尔基大街上，几个带着冲锋枪的红军战士曾拦住过我。他们是执勤的巡逻队。接着几辆满载红军战士的卡车急驶而过。他们那“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的歌声随风飘扬。

路漫漫地伸向远方。

前面是夜，令人难受的无尽的长夜……只要一天不投身于党所托付的工作——新的象往常一样令人兴致勃勃、激动人心的崇高使命——焦急的心情总也无法平息，无所作为的内疚就会一刻不停地折磨着我。

次日清晨，萨沙·特沃罗戈夫来到了我当时下榻的“莫斯科”旅馆的房间里。我和他在勃良斯克森林里就认识了。萨沙还很年轻，二十岁刚出头，可看上去还要年轻。他穿了一套簇新的但晃里晃荡不合身的夏装。萨沙推了平头，一副孩子般的圆脸晒得黝黑黝黑的，看去很象是个学生，或者更准确点说，象个军校的年轻学员。谁会知道，这个年青人却有着一番久经沙场的老游击队员的经历！

战争初期特沃罗戈夫所在的部队陷入了敌人的合围。但年轻的战士丝毫没有惊慌失措。他和同伙们一起冲出了白俄罗斯的丛林向前线运动，並沿途消灭了敌人数辆汽车。一九四一年秋天，他们这队人马来到了勃良斯克森林，加入了我指挥的游击队。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首次作战萨沙就表明自己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他处变不惊，具有超群的侦察员的才干。他为人谦虚，工作勤奋，很快就博得了我们大伙的好评。萨沙成了游击队的侦察队长。在这个职位上他干得十分出色。

极力想显得老成持重，使萨沙养成了皱眉头的习惯，並

总是保持一种独特的矜持。一到我这，他就一本正经地问起将何时起飞，飞向何方。至于干吗要让他参加这支队伍——这业已确定——萨沙没存任何疑虑。

“您要选几个老伙计吗？”他问，显然指的是我们在勃良斯克游击队的战友，接着马上就建议说：“最好把达尔贝克·阿布德赖莫夫调来。然后再找二十来个人。名单我会给您拟好的……”

不一会儿游击队参谋长帕顺少校也到了，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刚任命的政治副队长斯捷霍夫少校。他外表整洁 神态端庄，脸精心地刮得光光堂堂。斯捷霍夫到军队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已觉得自己是个地地道道、正正规规的军人了。看见我在和特沃罗戈夫谈话，他有些急不可待。

“游击支队的根据地预选在罗夫诺市所在地区，”我针对着特沃罗戈夫的问题说明道。“这个选择可不是想当然。法西斯匪徒在罗夫诺建立了被其占领的乌克兰领土的‘首府’。坐镇这个首府的是希特勒的代理人、帝国部长、统辖帝国专署的埃里希·科赫。他掌握着对乌克兰土地上的希特勒匪徒的指挥大权。”

“为什么他们要呆在这儿？”特沃罗戈夫问。“而不去基辅。”

“想必，他们以为罗夫诺距离前线一千五百公里，龟缩在罗夫诺更加安全吧。要知道西乌克兰——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她是我们苏维埃大家庭中的一个小妹妹。她处于外国干涉者的蹂躏下不是一年，也不是两年，已有多年。长期在那儿作威作福的先是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则是波兰地主。在那块土地上依然存在着富农阶级、昔日的地主及其走狗，存在着彼得留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残

渣余孽及其它一些我们祖国的怙恶不悛的敌人。这些人本性难改，现在又在为希特勒匪徒效劳。正因为如此，纳粹头目科赫选择了坐镇罗夫诺，而不是基辅。然而在那儿他也未必会得到安宁！……”

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吸收几个西乌克兰出生的並十分熟悉西乌克兰的人加入支队。寻找和挑选这些同志的任务就交给了特沃罗戈夫。

……我们游击支队——眼下还在莫斯科——的成长和壮大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人们接连不断地到来，我和斯捷霍夫简直应接不暇，来不及接待所有的自愿报名者。况且每一个被吸收加入支队的人还请求再接收一、两个自己的熟人加入支队。不断有一些被介绍的熟人打来电话或亲自闯来。

比如，有一次一个自我介绍叫作采萨尔斯基大夫的年轻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可我几乎刚刚放下电话听筒，他就出现在我面前了。他请求让他加入游击支队。

“作为一个医生您太年轻了，”听完了他的请求后我说。

“我毕业于医学院。当学生时就曾在斯科利福索夫斯基医学院实习过。”

“您是外科医生？”

“是的。我熟悉野战外科。”

“您是外科医生这很好，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治疗各种疾病的多面手，而且是一个能让战士信赖的人……”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我不能吹嘘自己。请您向支队的同志了解了解我的情况，他们认识我。”

“哪些人？”

“什穆伊洛夫斯基、谢列斯克里基、巴扎诺夫，还有很多人！……正是从他们那我得知您在组建支队。”

我仔细地端祥了一下自己的这位谈话对手。这是一个个子高高的身材匀称的青年，长着一头深色的卷发，容貌端正……他显然是在竭力控制自己以免失态，只有那双眼睛显露出他内心深藏的焦躁不安。他正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我的答复。我挺喜欢这个青年。我觉得他真切地渴望着奔赴与敌斗争的最危险的地方。

我已经准备同意接收他了，突然一件事制止了我。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年轻医生穿着军服——佩有领章的军大衣和船形帽。

“您已经参军了？”

“是的。战争一开始我就向莫斯科团市委递交了参军申请。我要求派我上前线。军队接收了我，可却把我弄到了内卫部队。”

“但现在他们是不会放您走的！”

“只要您提一下，肯定行……”这青年觉得难以启齿。
“我不想呆在后方。请您务必争取一下……”

半小时后我到了内卫部队上将司令员的办公室。

“您师的军医采萨爾斯基请求加入梅德韦杰夫上校的游击支队、”将军一边迅速地浏览着采萨爾斯基的报告，一边在电话中向对方说道：“您认为如何？”

听完对方的回答后，他做出决定：

“那么这回算是一次例外吧。”

接着将军在报告上批示道：“同意将采萨爾斯基调归梅德韦杰夫同志指挥。”

……游击支队进行了一个来月的训练。在莫斯科郊区的

一个树林里，我们设置了一个营地。我们住在那每天练习射击，研究战术。离营地不远有一个湖。我们利用这一条件演练扎木筏，并用木筏从湖的一侧渡到另一侧。

每到休息时间大伙就学歌，不仅会唱，而且把歌词背得滚瓜烂熟。对这件事的头号热心人和行家里手就是采萨尔斯基和他的朋友格里沙·什穆伊洛夫斯基。他俩比任何人都爱唱歌，并且唱得很棒，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歌曲可以大大活跃我们游击队的生活。他们经常说：“应该多学些歌带到那边去！”

那时采萨尔斯基只是晚上才出现在营地。白天为了收集大量的裹伤材料、药品和所有从深入敌后的那一天起就可能用得着的东西，他整日在城里跑来跑去……

后来我又了解到我们的大夫那段时间所从事的一项活动。这就是他还进修了外科学，读了大量的医学书籍，并多次去请教母校的教授。他要成为一个能治疗各种疾病的医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作为游击支队的队长，我利用一些时机向人们介绍我们即将开始的生活。在勃良斯克森林里指挥了半年游击队的经历使我能够预见到即将开展的工作的恶劣条件和等待着我们的困难。我毫不隐瞒地向同志们将这一切合盘托出，告诫同志们，使他们对艰苦的条件和与游击队员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经常遇到的险情做好充分思想准备。从人们聚精会神默默听讲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我们面临的危险和艰难困苦没有引起任何的恐惧。

然而立刻飞到罗夫诺州萨尔内森林中指定地点，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萨尔内森林距离莫斯科甚远。飞机只有在夜间才能飞越敌占区，而春季的夜又很短。因此飞机往来不

及趁天黑飞完整个航程就得返航。而且，苏联飞机的出现很可能引起希特勒匪徒对萨尔内森林的注意。这样一来，游击支队就会立即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因此，我们决定飞得近些，不直接飞往萨尔内森林，而是在莫济尔森林空降，然后从那儿步行向指定地点集结。位于罗夫诺州界上的穆霍耶德村一带被确定为空降地域。

五月末，由十四人组成的第一小队起飞。领导这个小队的是萨沙·特沃罗戈夫。在全支队的战士名册中，他名列第一。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在穆霍耶德村一带见面，”飞机起飞前我叮嘱他。

过了两天我们收到了一份无线电报，特沃罗戈夫在电报中报告说，小队没有降落在莫济尔森林中，而是降到了日托米尔以南，几乎相差三百公里！加之，该地无森林，无处隐蔽。

又过了一天，特沃罗戈夫来电报告了自己克服一切困难向莫济尔森林，向预定集结地靠拢的决心。然而电报没有拍完就突然中断了。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一天、两天、三天——依然联系不上。能出什么事呢？

于是我们决定派出第二个小队。必需找见特沃罗戈夫并保障全支队空降的任务交给了领导这个小队的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科切特科夫。但是这次我们依然没有成功：科切特科夫和他的同伴同样也没有降落到穆霍耶德村附近，而是偏北了二百公里。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科切特科夫终于从托尔斯特列斯车站拍来了电报。该站位于切尔尼科夫——奥夫鲁奇铁路线

上，距离穆霍耶德三十公里。科切特科夫报告说，他在那停了下来，准备接应下一队空降人员。

这下人们的情绪才变得高涨起来。支队参谋长帕顺领导的第三小队飞往托尔斯特列斯。这个小队没有配备报务员——我们的报务员不够用，但是他们当中有两个既非常熟悉莫济尔森林，又非常了解托尔斯特列斯车站的游击队员。

我们通知科切特科夫，让他用篝火来给飞机指示空降点。

“篝火已经点燃，”科切特科夫回答。

我彻夜不停地在房间里踱着步子，从屋子的一角走到另一角，坐立不安，没有丝毫的睡意。我频频地看表，大概正因为如此，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随着拂晓的到来这种等待变得更加折磨人。天色越来越亮，我心中也越来越不安。当机场上终于传来盼望已久的“顺利返航”的报告时，我觉得这一夜简直把我弄得精疲力尽了。

“一切正常，”驾驶员报告说。“伞兵全部投向托尔斯特列斯车站一带的信号目标。”

然而那天早上科切特科夫却来电报告说，未发现任何飞机，尽管篝火烧了一整夜。出了什么鬼？显然伞兵又投错了地方！帕顺没有报务员，所以从他那是不会得到任何消息的。

特沃罗戈夫失踪了，帕顺也不知去向……

“我要亲自前往，”我当机立断，并立刻请示统帅部。然而统帅部拒绝了我的请求。只好耐心等待。

同下一批，第四小队人员一起空降的是谢尔盖·特罗菲莫维奇·斯捷霍夫。令人无比沮丧的是，他这组人员同样也没有空降到科切特科夫设置信号的地点。

“没有发现任何飞机，”科切特科夫报告说。斯捷霍夫则来电报告说：“我们一连三天无法确定所在地的位置。派出侦察的人亦没有返回。”

我内心的不安已达到了顶点。我坚决要求上级允许我亲自去。上级终于同意了。

和我一起空降的有在特沃罗戈夫失踪后被指定为支队侦察队长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金，女报务员莉达·舍尔斯特涅娃和几名西班牙籍战士。

他们是那批曾经为保卫自己祖国的自由而战，尔后为躲避弗朗哥法西斯恐怖而来到苏联的西班牙同志。伟大卫国战争开始后，视苏联为自己第二祖国的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们，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把他们派到前线去。这样，有十五名西班牙人编入了我们支队。

六月二十日黄昏，我带领一小队人来到了机场。一支队的战友们前来给我们送行。

用于告别的时间不长。前来送行的同志们知道，我们将飞往西部地区，不可能很快就给他们写信，但他们什么也没问，只是祝我们一路顺风、吉星高照，并说些既干巴巴的又意味深长的送别之言。然而这些话却掷地有声，深深铭刻在我们心里。

在预定的时间里，飞机准备完毕。再见啦，莫斯科！

象以往一样，上路后最初的几分钟我们的思绪依然停留在那个刚刚离开的城市，依然和那些一刻钟前与我们握别的同志们在一起。渐渐地，这种惜别之情消失了，代之以新的意念。这些意念已不再是对过去和往事的追忆，而是对随着早晨的到来而即将开始的另一种未知和激动人心的新生活的遐思。机舱里活跃起来，人们开始了交谈。还有人唱起了

歌，一支接一支，一会儿是俄文的，一会儿是西班牙语的，一会儿又是乌克兰话的，这样持续了一路。

飞机飞越前线上空时，落入了探照灯耀眼的光束中。德军的高射炮弹在我们四周爆炸。但飞机幸运地通过了危险区。又飞了一小时后，传来了准备跳伞的口令。

我望了望舷窗外，清楚地看到了地面燃起的篝火。飞机边盘旋边降低了高度。我们一个挨着一个站在敞开的机门旁，门外是茫茫的黑夜和深渊。那情景很难使人不激动。

“开始！”

我第一个纵身跳了下去。

我们跳伞的高度很高——距地面九百公尺左右。夜空是晴朗的。我们头顶上挂着一轮明月。在我们脚下的地面上可以看见几堆篝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变得离我们越来越远——风使我们偏离了目标。其他几个跳伞的同志离我不远，就在我的上边和左右。这时突然有一个人从我身边擦身而过径直落下。我立即想到：一定是降落伞没有完全张开，这可要摔死人的。

我们脚下的树林清晰可辨了。我按照规定做好了着陆准备：交叉地抓住了伞绳。就在这一瞬间，一股强大的气浪冲过来，把我冲到了一边，然后双脚才终于触到了地面。风把我吹离树林边缘大约四十来米。

按预先约定的，我应点燃一堆篝火。这样着陆的同志们就会聚拢到篝火边。然而着陆时我给狠狠地挫了一下，以致站都站不起来，更不用说拾树枝来点篝火了。当时我只好收拢降落伞，点燃了它，然后准备好冲锋枪，爬进了近旁的小树丛。天知道此刻到篝火前来的是谁！

很快我听到了一阵轻微谨慎的脚步声，于是问：

“口令？”

“莫斯科！”

“熊，”我答了口令，然后提高了些嗓门：“把降落伞投进火里，向我靠拢。”

“是！”

来人是卢金，跟在他身后到来的是莉达·舍尔斯特涅娃，随后其他的人就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

三、四公里外传来了狗咬声，而且接连不断此起彼伏，仿佛是有人一直在撩逗它们。看来，不远的地方有村庄。

所有的人都聚齐了。最后一个赶到的正是我在空中发现的那个从我身边擦身而过的同志。他的伞没有完全张开，在眼看就要粉身碎骨的时候，突然他的脚碰上了沿铁路线架设的电话线，于是便化险为夷，真可谓万幸。

我站了起来，艰难地挺直了身体。

指北针，星空和铁路——这些足够告诉我们该向何处走了。托尔斯特列斯车站已经不远了。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距前线六百公里，距莫斯科上千公里的敌后。

(二)

夏日的森林身着绿装，分外妖娆。方圆几十里的空气中都弥漫着森林的气息——那是霉湿的针叶和芳香的树脂的气味混杂着花草的芬芳。

东方透出万道霞光，把地平线染成了淡蓝色和玫瑰色，照亮了还浸在暮色中的树冠。挂满露珠的小草在脚下窸窣作响。我们鱼贯而行，一个人踩着另一个人的脚印，在身后只留下了一道足迹。这样即使是有经验的猎人也难以断定，到

底有多少人从这儿走过。谨慎——这是游击队员的首要信条。

这座位于敌人占领区的森林是那样神秘和令人忐忑不安。谁知道，它会为什么人效劳，里面隐藏着什么人，又会迎头碰上什么人——是朋友抑或敌人？……

我们默默地走着，个个竖起耳朵，听觉高度紧张。周围是一片令人生畏的寂静。

早上九时，我们已经来到了距离托尔斯特列斯车站很近的地方。我发出了休息的口令，派出了潜伏哨，然后命令莉达·舍尔斯特涅娃开设电台。

还没等我布置完毕，派往前面担任潜伏哨的战士就带来了三个人。一看见我，这些“俘虏”都高兴地笑了。原来这是科切特科夫的侦察员。

四十分钟以后，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本人已经向我们讲述自己的厄运了。他们不仅被空投到预定地点以北二百公里的地方，而且全都掉进了沼泽地。他们个个成了落汤鸡，在沼泽地里从一个土墩爬到另一个土墩，整整折腾了一夜，直到拂晓时分总算踏上了坚实的土地。火柴湿了，无法燃起篝火，更谈不上烤干衣服。而且真可谓祸不单行：电台也进了水。报务员为了与莫斯科沟通联系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没有见过比这在敌后森林中的重逢更亲切更令人欢欣的了。在这儿我们不知为何都异常深切地感觉到，我们为坚实的纽带牢牢联系在一起，是那样的亲密无间，那样的相亲相爱。人们争先述说着各种见闻，宛若隔世重逢。最令人欣慰的就是斯捷霍夫和他的伙伴也在科切特科夫的营地。在这儿的还有采萨尔斯基大夫。按最初所定计划，他应和我一起出发，但由于科切特科夫小队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计划改